



讲诚信代代相传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大手拉小手让诚信传承下去



“智”说长江文化

之二十四

「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系列访谈

让长江文化深度融入沿线城市现代化

□ 本报记者 李先昭 廖健伟 印丹 曾寻宇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2022年初,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启动,江苏作为重点建设区之一,该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建好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同时又该怎样利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契机,推动长江沿线城乡融合及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新华日报社新华传媒智库记者专访了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所长、江苏省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院长张鸿雁。

激活历史文化资源,提升中华文化标识影响力

记者: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何重要意义?
张鸿雁:国家文化公园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是国家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国家文化公园强调整合一系列文化遗产后所反映的整体性国家意义,由国民高度认同、能够代表国家形象和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独一无二的文物和文化资源组成;国家文化公园具有社会公益性,可为公众提供了解、体验、感知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以及作为社会福利的游憩空间,同时鼓励公众参与其中进行保护和创造。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孕育了华夏5000年文明。长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的表现,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之轴”。长江流域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高地,也是文明高地,同时又是经济发展高地。因此,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充分激活长江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系统阐发长江文化的精神内涵,深入挖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对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丰富完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做大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标识的传播度和影响力,向世界呈现绚烂多彩的中华文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利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赋能沿江城市发展

记者: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对于城乡融合以及现代化城市建设有哪些推动作用?

张鸿雁:从历史上看,长江沿岸是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带,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上,也走在了全国前列。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存在着大量经济繁荣、发展质量高和生态环境好的沿岸城市。可见,长江一直以来对于沿岸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有着巨大的积极影响。也正因此,进一步建设、利用好长江,特别是长江文化,对于沿岸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无疑也有巨大推动作用。

从规划上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强调文旅融合、文化保护和生态保护。建设好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对于延续和发扬长江的历史文化文脉和自然生态环境,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而在继承和发扬长江文化的同时,长江文化也会给长江沿岸的城市提供文化和生态的赋能。例如,对长江沿岸城市的空间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文化保护项目以及城乡风貌的改造开发和保护,都有助于长江沿岸城市和乡村激发文化和生态潜力,推动实现长江沿线城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

挖掘江苏多元优势,助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记者: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的过程中,应如何挖掘和彰显江苏的多元优势?

张鸿雁:首先,在空间格局上,江苏江河交汇、通江达海,造就了江苏文化融合汇通的特点。在江苏,大运河文化、长江文化以及海洋文化提供了丰厚多元的文化滋养,共同造就了江苏地域文化的独特性。长江在江苏省内汇入大海,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通道;江苏地处长江和大运河交汇的特殊位置,又将中国内地与沿海连接起来,促进沿海地域、长江地域、黄河地域和北方地域的互动融合。

其次,江苏的沿江城市经济实力雄厚,具有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强大经济基础。长江沿线省市经济总量排名江苏省位居第一。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24座万亿元经济规模城市。其中,江苏有苏州、南京、无锡、南通4个沿江城市,江苏成为长江经济带万亿级城市最多省份。2021年全国百强县前十名,江苏占六席,全部来自沿江地区。

再次,江苏沿江城市的文旅资源禀赋出众。江苏省沿江8市拥有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个,4A级景区136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7个,省级旅游度假区27个;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5个,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22个。拥有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21项,国家级文保单位210个;沿江8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数量达11个(含县级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9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2个;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5个。

独特的空间格局、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丰富的资源禀赋,再加上江苏省内丰富的产业载体以及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都将成为江苏打造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优势。

加强顶层设计,营造亲水的滨江生活体系

记者: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在建设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建成后,长江沿江城市的建设又如何与公园形成良性互动?

张鸿雁:江苏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要注意规划须从全局出发,要有整体性,站在国家的高度,进行既具有江苏特色、又符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总战略的顶层设计,并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各地再进行规划和设计。

现在一些城市或地区在围绕长江做建设时,往往会出现重建轻用的现象,花重金打造了项目,却没有让这些项目真正融入沿岸居民的生活,导致了一些地方出现“滨江不亲水”的现象,这是不利于长江文化的长远发展的。

因此,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成后,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公园与沿江的居民生活相结合,也就是要让国家文化公园真正融入居民的生活体系当中,要通过公园的建设,弘扬长江文化,让长江文化真正成为居民生活和记忆的一部分。文化是人创造的,其进一步也需要人的参与。所以,只有让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才能真正体现出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所在,而有了人,有了生活,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才会更具有生命力。

借鉴国外优秀经验,探索全新发展道路

记者:国外一些国家公园的建设与发展,有哪些经验可供我们借鉴?与我们的国家文化公园有何区别?

张鸿雁:国外的国家公园是保护区的一种类型,最早起源于美国对“荒野”的保护,后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所采用;1872年,美国国会批准设立了世界最早的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

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是从国家公园衍生而来,是我国首次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和探索,两者在目标上虽然有不同侧重,但在对国家精神的构建上,具有一定相似性。例如,美国的国家公园常通过荒野景观、地标景观的展示,强调国家精神的建构,体现主流文化价值;日本的国家公园则在将文化遗产与当地生活载体结合,形成整体性保护的同时,以创新的方式激活文化遗产,促进全民参与;英国则通过国家公园体系,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同时将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相结合,实施可持续旅游战略,放大人文资源,强化特色文化品牌。这些国外国家公园的成功经验,都是我们在建设国家文化公园中可以借鉴的。

欢迎关注“智”说长江名家专栏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高质量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的工作要求,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大力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长江文化研究和传播基地”面向海内外智库名家开设专栏,加强对重大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及实践经验研究总结,让长江文化展现时代价值、惠及人民群众。



扫描二维码
观看专题

扫描二维码
观看视频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智库专家谈

立足产业创新发展 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 徐康宁

党的二十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基础,直接决定了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前景和命运。尤其是进入到数字经济时代,关键核心技术起到的战略性、全局性的作用更加突出,是绕不过去的门槛和围墙,必须以大气力加以突破。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一定要立足于产业创新和发展,紧紧围绕产业创新能力和产业链完整性,确立什么是关键核心技术,如何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怎样用于产业创新和发展,以及如何摆脱我国一些关键产业所需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局面。已有充分的经验教训表明,脱离产业发展实际需求的技术研发活动只能是空中楼阁,脱离产业链的创新链也难以真正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必须与产业创新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技术创新必须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关键核心技术涉及范围很广,“卡脖子”技术难题也不在少数,不能不顾自身条件和实际情况都同时去硬性突破,这不符合科技发展的规律,这样的盲目攻坚战也很难成功。要科学冷静分析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进步、差距和追赶潜力,按轻重缓急分门别类加以排序。首先应在有先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以及在引导未来产业发展的基础前沿技术领域,集中力量配置资源,加快实现攻关突破。例如,在数字产业化领域,应充分利用我国数据量大、应用场景丰富的独特优势,加快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信息、智能网联汽车等具有先发优势和代表前沿方向的产业领域的重大技术攻关,并为芯片整体技术进步培育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以“着眼长板带动补短板”的方式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在产业数字化领域,应用我国制造业规模巨大、实体经济产业结构齐全的优势,重点突破以数字化技术提升原有产业的关键领域,如控制软件、智能生产、高水平工业互联网平台等。

面对需要突破的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必

须首先要构建一个高效的产业创新生态,以集群式创新的方式实现高水平的产业创新。创新集群是产业集群的高级形态,是产业演化升级的一个内在规律,创新集群形成的过程就是新技术创造和外溢的过程。苏州发挥实体经济发达、产业门类齐全的优势,紧紧抓住数字经济带来的新机遇,瞄准产业迭代升级和集群创新能力提升,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先进材料四大产业,以加快产业创新集群发展推动产业的整体创新,是高水平推进产业创新的一条新路子。今年上半年,在疫情反复和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苏州电子信息等四大产业创新集群产值仍然实现同比增长4.1%,其中集成电路产业增长26.8%,前沿新材料产业增长16.3%,生物医药产业增长8%。

一个产业集群内部,有各种具体的产业组织,如龙头企业、配套企业、行业协会、技术服务平台、信息中心、技术培训学校等,产业创新要善于有效配置各类创新资源,构建集群式创新生态,增强创新活动的协同性,在产业集群内生产协同功能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协同的功能,推动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转化升级,最终实现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一是要把产业内部的创新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发挥多企业协同创新和产业链创新的作用,形成创新的集群效应,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奠定坚实基础。二是要在产业内部建立创新联合体,发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技术服务平台等方面的作用,把更多的创新资源引入汇聚到产业来,形成有合力的创新链,围绕关键核心技术进行联合攻关。建立创新联合体必须以企业为龙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各方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紧密融合。三是要注重发挥创新集群信息中心的独特作用,使创新集群成为产业信息和产业技术交流的枢纽,从而扩大在国内外产业界的影响。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还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最大范围汇聚全球创新要素,推进高层次的产业国际合作。在数字经济时代,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许多产业创新都是以国际产业链为基础的,最先进的技术往往是整合了全球创新资源的结果。以世界上最尖端的光刻机为例,这种价值十几亿元人民币,由十几

万个复杂零部件组成的芯片制造关键设备,集成了包括荷兰、德国、日本、美国等多国的先进技术,不单单是一个国家内部产业链的产品。必须看到,许多产业的关键底层技术、尖端技术的源头并不在国内,突破这些技术离不开国际创新资源的利用,尤其是要引入世界级的高层次创新人才。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要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要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推进产业创新,必须将产业集群本身打造成高度开放和有利于全球创新要素融合共生的创新空间,从而由我主导并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产业创新能力提升。为打造这样的产业创新集群空间,可选择部分开发区试验建设特别的“数字经济自由贸易区”。一切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的开放政策都可以在那里先行先试,促进试验区数字经济贸易自由化,汇聚高水平的数字创新要素,在高度开放的环境中培育一批国际领先的数字产业关键核心技术。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必须下大力气掌握一批重大原创性引领性技术,这是作为一个现代化大国必须具备的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提到要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这充分体现了我们要实现的科技自立自强是高水平,是从战略上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这就要求我们在重点上舍得放弃一些现在成熟却始终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追随的产业技术,敢于攻破能够带来重大产业变革的原创性引领技术。有的产业技术属于边际性改进,是在原有关键核心技术的框架内做一些新的改善,使产品或工艺更加精细一些,生产成本更低一些,但这样的渐进式技术很难催生一个崭新的产业。推动产业全面升级,布局未来产业发展,一定要瞄准战略性、前瞻性、颠覆性技术变革,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开辟崭新局面。

(作者是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系作者特色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决策咨询类)“数字经济时代提升苏州产业集群创新水平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高效能治理的理论内涵与江苏实践

□ 马海韵 陈黛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处提及“治理效能”,包括“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等,强调了“治理效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意义。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的“高效能治理”概念,是对理想、臻善“治理效能”的高度凝练和精准概括。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高效能治理实现新提升,是“十四五”时期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江苏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将“社会治理效能显著提升”作为未来五年江苏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当前,全面思考、多措并举提升江苏高效能治理水平,是江苏以实际行动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江苏作为的重大举措。

高效能治理的理论内涵

高效能治理,既包含效率、效果的内涵,也包含能量、能效的义,本质上主张管理哲学或管理主义理念,重塑主体和客体、目标和过程、绩效和成本、动态和静态、发展和安全、眼前和未来等多组关系。因此,“高效能治理”是对治理的某种状态进行描述,是积极的、理性的、安全的、高效的、效果好的、性价比高的治理过程和结果。高效能治理致力于单位资源有更高的产出水平,致力于既定制度有更优的绩效表现;支持相同绩效下更小的政府规模,支持单位GDP有更低的碳排放;反对“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高代价治理模式,反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低成效治理模式。

高效能治理的江苏实践

根据高效能治理的理论内涵,结合江苏发展的实际情况,江苏高效能治理实践中要处理好下述几组关系。

一是高效能治理需要处理好政府规模和政府绩效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经2018年全国省级机构改革后,全国各地省级政府机构数量较为均衡,普遍偏重投入产出比的高效能发展模式。江苏宜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规模适度—高绩效政府为建设目标,把握政府规模与绩

效的变动关系,在既定的政府规模和机构编制基础上,创新成本控制路径,以适度成本产出更好的绩效。

二是高效能治理需要处理好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是辩证统一的,两者间有内在相关性和互动性,一方面,制度优势是生成治理效能的基础;另一方面,提升治理效能既是对制度优势的积极强化,也是必要实践证明。江苏在要素市场化配置、城乡协调发展、经济绿色转型、基本公共服务、自贸试验区等方面一直在积极探索体制机制等各种制度创新,要想想方设法发挥这个优势,就要保障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之间的资源整合优化、内核价值彰显、运行衔接协调、效能集成提升等诸多环节,有效融通江苏发展特色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契合性。

三是高效能治理需要处理好GDP增长和碳排放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GDP碳排放”是指产生万元GDP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碳排放与GDP之间的动态效应强烈程度反映一个地区GDP增长对碳排放依赖程度的大小,说明经济发展的生态代价。2020年,江苏单位GDP能耗约0.34吨标准煤/万元,全国平均单位GDP能耗是0.549吨标准煤/万元,而广东单位GDP能耗为0.31吨标准煤/万元;江苏单位GDP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8%,但高于广东9.7%,还有努力控排的空间。因此,江苏需要进一步降低单位GDP能耗,助推“率先碳达峰”目标。

四是高效能治理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省域安全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确定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当前,我国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经济平稳运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安全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关切因素;保障安全,才能保障发展的效率和成果。作为经济大省、化工大省和人口大省,江苏省实体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超过80%,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制造业集群,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全国1/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居全国第一。江苏要充分认识到自身勇挑

经济大梁的使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大要求,做到防疫、经济、安全三件大事。

五是高效能治理需要处理好数字政府和以人为本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完善网络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数字政府是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优化政府治理流程,创新政府管理模式,实现政府自身及外部的全面智能化。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意义重大。目前江苏正在统筹推进数字政府“四梁八柱”,推进“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数字技术在发挥巨大效能的同时,也伴随着数据鸿沟、数字壁垒等现象。所以,既要发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效率,也要努力形成数字技术应用中“全员友好”“全龄友好”的局面,充分考虑“为谁而做”和“为何而做”的问题,以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和真实问题为起点进行数字政府规划和建设;打破对单一技术的依赖,以多样化技术满足不同人群的实际需求和真实问题;针对数字弱势群体提供线下服务方式托底,避免系统性的社会排斥现象发生,保证数字政府的均等化和包容性。

六是高效能治理需要处理好公众参与和决策效率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提高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增强决策执行力、服务效能,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提高政府决策效率和公信力”。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可以给政府决策和政府治理提供丰富的制度资本,提高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中公众参与是应有之义;但是,公众参与常意味着更丰富的参与主体,更复杂的决策过程,会对政府决策模式及效率产生某种影响。所以,为公众参与提供有效的指引方法和制度支撑显得尤为重要。在致力于未来五年江苏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之一“社会治理效能显著提升”过程中,要结合“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明确赋予公众参与启动权,从全周期、全流程管理维度把握公众参与和公共决策之间的关系,提供参与主体多元化与公众参与方式多样化并重的路径选择,保障公众参与协同实现稳定的决策效率。

(作者分别为南京工业大学应急管理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教授,南京工业大学应急管理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政法学院研究生)